

# 儒风兴起：惠州文气从“进口”到“自产”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插图／杜卉

隋代开始，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员便不断影响惠州儒学风气，至唐宋则成为兴盛期。在他们的推动下，惠州文化教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到了南宋，惠州书院讲学之风兴起，人才辈出。以理学家罗从彦为首的名儒们在罗浮、西湖的书院讲学，在岭南播下了宋代理学的首批思想种子，为开启惠州文化教育一代新风立下大功。明朝杨起元有言：“尧封禹服原千古，风气人文又一番。”至此，惠州这一座“梁化旧邦”的衣冠文物已几乎与中原无异。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各级官办学校是传播儒家文化，培养国家管治人才的主要教育机构。岭南教育与中原相比发展较晚，何时开始兴办学校尚难确定。但至迟在西汉后期，儒家文化已在岭南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岭南士子积极进取，跻身封建官宦集团，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社会的汉化过程，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惠州地处粤东，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开发较早，羊城晚报记者特地专访了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包国滔。

的资料看，直至隋代才有官员在惠州兴办学校、推行儒家教育，隋文帝重臣柳机之弟、龙川太守柳旦正是始作俑者。

据《隋书·柳机传》载，当时郡中“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柳）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隋炀）帝闻而善之。”这是史籍中关于惠州官府兴办儒学以教化社会、改变民风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后，唐宋两代都有大批官员在惠州兴文助教，开始了儒家文化在惠州传播的新篇章。

## 叁宋代官学遍布人才辈出

唐末，黄巢入粤攻掠潮、循二州，唐王朝丧失了对岭南的管治权，群雄争粤，南汉最终获胜。起初，南汉政权重视儒教，按唐制设学校、立科举，躲避战乱的中州人士争相迁至岭南；然而，南汉内部很快陷入斗争，政权暴虐，文化教育乏善可陈，所幸时间不长。宋开宝四年（971年），赵匡胤平南汉，惠州地区归入宋朝版图，文气始兴。

宋代重文轻武，以文制军，朝廷重用儒臣，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进士须通经义，遵周礼之礼”。当时普遍采用的儒学开蒙教材《神童诗》中的第一首诗即毫不掩饰地宣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获得



宋代惠州籍宰相留正

进士总数为713人，而从唐长庆四年（824年）到乾符四年（877年）约五十年间，惠州就有三人考中进士，即韦昌明、郑隐和张昭远，其中韦昌明所作《越王井记》是现存最早的惠州文章。

这3名进士，虽然仅占同期全国进士总数的0.42%，如果以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仍不算很落后。就广东地区而言，唐代中进士者38人，惠州3人，占7.89%，亦远高于全省25州的平均水平。若与自身作纵向比较，更是零的突破，很有象征意义。

统治阶级进一步的确认，而科举考试制度也更趋完善。

各州县都设有儒学，委任学官主管地方教育，特别是经过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学校之设遍天下”；合并简化考试科目，以三年一试为定制，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殿试的方式把省试合格的考生变为“天子门生”，提高进士的政治地位；扩大取士名额，只要通过殿试，不管合格与否，全部录取安排官职以广纳人才。

到南宋，广东全部州学、过半县学相继创立。惠州1州5县（含龙川）先后兴办州学1所，县学3所。陈尧佐、苏东坡、唐庚、刘克庄、杨万里、李纲、文天祥等一批优秀的官员、学者、诗人相继踏足惠州，更令惠州“风气人文又一番”。

儒学的兴办，改变了唐代和宋初偏重科举考试而忽视学校教育导致的人才不振。据清光绪《惠州府志·选举表》统计，宋代惠州各县录取进士54人，诸科13人。其中，归善为州治之所，亦为州学所在地，全县至宋室南渡前后共考取进士6人，都是出身于府（州）学，可见官学在惠州儒学教育中已发挥重大的作用。进士留正更是官至右丞相，历孝、光、宁宗三朝，被孝宗称为“真宰相”，是宋代惠州儒学代表者。

有学者指出：“宋代广东共有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较多的就是广州、惠州。”

## 肆朱熹的师祖曾在惠州办书院

宋代地方官对中央政权文教大政策往往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大都能把恢复和兴办学校作为振兴一方的重要政务，这是惠州文化教育在宋代获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嘉靖丙辰《惠州府志》中就有大量宋代各级官员在惠州兴学的记载，最早在惠州兴办书院的罗从彦（博罗县薄），赵汝驭、刘克刚（均为惠州知州）等，均是任职惠州的朝廷命官。

这批惠州地方官员以振兴地方文教为己任，或募集资金创辟书院，或择地开基兴建学校，或揀选贤能以充师儒，或亲主教席训守诸生，为惠州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钧鳌书院的始创者罗从彦，在讲学途中病死于客舍，竟因家贫而数年不得归葬；又如惠州知州刘克刚，始创丰湖书院，在病重将死前夕仍记挂着书院的发展，把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叫到床前，再捐资钱千缗以增建学舍。他们以身垂范，为发展惠州文化教育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除官学外，南宋惠州大兴书院，设席讲学者亦多为名儒硕学，如钧鳌书院的罗从彦“潜势力行，任重指极，士之游其门者甚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是他的再传弟子。讲学于张留书院的留正和张来卿，也是德才兼备、位致通显的栋梁之材。这些优良的师资，是惠州文化教育在宋代获得长足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惠州是岭南儒学主要发源地之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奠定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的基础。儒家文化如何在惠州（岭南）传播开来，又何时达到鼎盛？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特地专访了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包国滔。

**羊城晚报**：根据您的研究，隋唐以前惠州（岭南）地区的儒家文化氛围如何？

**包国滔**：就现有的研究而言，隋唐时期岭南地区特别是惠州市，较为流行的是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由于当地生产力水平较低，道家、佛教提倡的虔诚信仰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与之相反的是，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相匹配，故儒家文化在岭南地区发展较晚，至于何时开始兴办学校，尚难确定。



丰湖书院的古牌匾

但至迟在西汉后期，惠州民间办学逐渐兴起。这里是岭南地区儒家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士子积极进取，跻身封建官宦集团，进一步促进了这两地的汉化过程，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羊城晚报**：为何儒家文化在惠州（岭南）地区的发展如此之晚？

**包国滔**：隋唐以前，较惠州（岭南）地区而言，中原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都较快，当时都称惠州（岭南）地区为蛮荒之地，部分到此任职的官员，或是得罪上级，或是犯了错误，多有贬谪之意。隋朝的柳述以及宋朝的苏东坡都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来往交流较少，儒家文化主要在中原地区传播，儒学传播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但当时岭南地区生产力比较落后，并非人人都可以上学受教育。

## 文史杂谈

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 兰陵公主曾请求随柳述徙岭南

历史不仅有铁血与悲壮，还有温婉凄美的一面。

公元604年，隋朝驸马柳述被贬龙川（今惠州）。他是惠州史上第一个从中原朝廷贬来的官员，也从此开启了惠州长达千年的贬官文化。

这些深受中原文化浸润的官员来到岭南，对这里的文教风气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他们自身的足迹和作为，也成为当地文化积淀的一部分，为后世所铭记。

这里说一个历史细节，一个人。她是柳述的妻子，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最爱爱的女儿，兰陵公主。

### 15岁阿五初嫁

提到公主，给人的印象，大多刁蛮霸道。毕竟，皇家血脉，娇生惯养，眼睛看人难免居高临下。然而这位公主却不同。史书记载，兰陵公主“美姿仪”“性婉顺”“读书知礼”……

身为公主，仪态高贵，性情温婉，堪称完美。也因此，隋文帝杨坚也很宠爱她。

然而，谁能相信，这样完美的她，命运却十分凄惨！

皇家儿女长大，难免面临政治婚姻。

15岁那年，那时还被唤作“阿五”的小姑娘，嫁给了北周重臣王谊之子王奉孝。这个王谊，是杨坚的政治盟友，他骁勇善战，为日后杨坚称帝出了大力。

不久大隋代北周，杨坚君临天下，阿五被封为兰陵公主，王谊成了郢国公。

这本来也不坏。但可惜的是，青年才俊王奉孝命太短，不久夭亡了。

贤良知礼的兰陵公主穿上孝服，要为丈夫守孝三年。

公公王谊也可怜这个儿媳，上表请求为公主免去俗礼。谁料想，身在政治漩涡中，很容易被政敌利用。登临大位的杨坚要行“王道”，倡导忠孝节义。王谊的行为遭御史大夫

杨素弹劾，杨坚也十分尴尬。此事令两人关系产生了裂隙。此后王谊频遭政敌打击，甚至涉及谋反罪，最终被赐死。

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公公，兰陵公主的处境何其尴尬！

### 18岁再嫁柳述

杨坚对这个女儿还是关心的，要给她再找个好丈夫。

然而谁料想，这让兰陵公主卷入了更大的政治漩涡！

兰陵公主二哥、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王妃萧氏是西梁公主，品行端庄、举止优雅，隋文帝夫妇都很喜爱。萧氏有个弟弟叫萧瑒，年龄和兰陵公主相仿，于是杨广保媒，杨坚夫妇也很满意。

萧瑒又生变故，时逢萧瑒父亲萧岿驾崩，他要守孝三年，婚事被拖延，变数即生。

萧岿原和杨坚交好，如今萧岿亡故，两个政权的关系随之瓦解，不久西梁为隋吞并。

很快，又一个令杨坚满意的年轻人出现了，他就是柳述。

这时晋王杨广平定了陈朝，声望正隆。杨坚要考虑平衡杨广和太子杨勇之间的关系，有意培植太子的势力。而柳述是重臣柳机之子，杨坚想借柳家来达到势力均衡。

兰陵公主下嫁柳述后，对丈夫温柔体贴，对公婆尊重孝敬，口碑极好。丈夫柳述也积极向上，受到岳父杨坚的器重和喜爱。杨坚对他关照有加，年纪轻轻就“摄礼部尚书事”，随后又代理兵部尚书。杨坚废易太子后，为牵制新太子杨广的势力，杨坚让柳述直接出任兵部尚书。

### 32岁郁郁而终

如果就这样岁月静好，对兰陵公主来说也是一种迟来的幸福。

然而随着独孤皇后的去世，隋文帝杨坚病危。在老皇

## 文脉历程

## “最好的地方”都用来办学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唐宋时期的惠州万象更新，文化教育的表现最为突出。那么，千年之后的本地专家、学者、文化人怎么看唐宋时期惠州儒家文化的兴盛？

## 中原文气育出本土文人

“从隋唐开始，惠州开始崇文重教，文人逐渐从‘进口’转向‘自产’。”原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惠州本地著名画家黄澄钦表示，惠州的教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开始时，惠州先后迎来了数百位来自中原的官员、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苏轼。他们留下了大量歌咏惠州、歌咏西湖的诗篇，苏轼用诗文让人们认识了惠州。这一阶段，姑且称为“进口”文人阶段。

黄澄钦表示，这些外来的文人在寓惠后，纷纷将中原儒家文化的礼乐衣冠一并传授给惠州本土读书人，逐渐将当时岭南地区的所谓“化外之人”汉化。历代州官重视“山水有助于人文”的辩证关系，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办官学、书院。比如周敦颐后人在西湖玄妙观旁办天泉书院，伊秉绶设无碍山房。渐渐的，受到教化的本土惠州人也崇文重教，尚书、御史、文人墨客纷纷涌现，官学里也开始出现有水平的本地教师。

## 经济发展推动文教兴盛

自此，惠州成为岭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衣冠风物甚至可以与中原媲美。“晚清人许雪田说‘此湖此水不深浅，招鹤放鹤成古今’，这是最准确的定论，鹤就是人才。”黄澄钦表示，惠州素有“地灵人杰”之说，实际上二者是互换效应。唐宋之前，惠州不算太开化，灵在能容“人杰”，可称为“地灵人杰”；唐宋以后，此地人杰辈出，便产生“人杰地灵”之效，甚至有“天下不敢小惠州”之说。

事实上，除了文化教育，此时的惠州万象更新，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此时大约正是惠州正式得名之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的表现以文化最为突出。”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学者何志成介绍，唐代惠州地区只出了3名进士，而宋代和明代分别出了54名和45名进士，说明千年前的这个节点，GDP迅速增长的惠州开始大力发展教育，兴建官学、书院，对惠州人才培养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 宾兴馆特设唐宋儒学展

“可惜的是，目前惠州并未发现唐宋时期的儒学相关文物遗存。”惠州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介绍，虽然唐宋时惠州儒学就已相当兴盛，但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文物材质不便于保存，目前惠州并未发现该时代的相关文物。

据钟雪平介绍，此前，惠州市博物馆在筹建古代科举制度陈列馆（宾兴馆）时曾向全市征集文物，数月时间只征集到部分清代、民国时的文物，像几个参加考试所用的篮子，甚至无法判断是否是惠州本地产物。

目前，城内现存最早的儒学相关文物均是清代文物，如清代广东才子李湘为丰湖书院撰写的石刻名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等。“如果市民想了解唐宋时期的惠州儒学发展，可到古代科举制度陈列馆参观。”钟雪平说。